

# 理雅各——从传教士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宋 新

**摘 要**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于鸦片战争期间来到香港进行传教活动。他深深地被中国的古文化所吸引,第一次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架起了一座永载史册的桥梁。在东方以及东方文化倍受瞩目的21世纪到来之际,我们更加钦佩这位文化交流使者和伟大学者的远见与卓识。

**关键词** 理雅各 传教士 四书五经 中西文化 文化交流

詹姆斯·理雅各于1815年12月20日出生开苏格兰北部的一个小镇。少年时期,受家庭的影响,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神学院学习。

1840年他先到马六甲,后于1842年到香港,开始了传教生涯。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理雅各热爱上中国和它的古文化,并开始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和英译工作。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于1861年至1894年间陆续出版了代表中国古代文化最高成就的四书五经的英译本。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构成中国几千年来伦理道德、政治、文化、经济生活的基础,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东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正因如此,理雅各才倾注了毕生心血从事它的英译工作。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从事翻译工作时,中国正处于被外国列强瓜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当时的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毫无地位可言。理雅各不顾种种偏见,以他博大的胸怀,坚韧的毅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克服重重困难,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

今天的东方正在崛起,东方文化也越来

越受到西方的重视。而在一个多世纪前,一名传教士能有这么深远的眼光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我们怎能不敬仰他呢?

## 一、理雅各的学生时代

1829年理雅各进入亚伯丁中学学习,并开始展露在学习方面的卓越才华。理雅各极具语言天赋。由于他的聪明好学和优异成绩,同学和老师们都一致认为他将在中学毕业时获得亚伯丁皇家学院的一等奖学金。然而在一场意外事故中他的大脑严重受伤,大家都认为他不可能再参加考试了,但理雅各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获得了一等奖学金。这是他第一次在学习方面展示他的毅力、决心和能力。

进入大学后,他更加刻苦而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他决心在四年后大学毕业的时候获得哈顿尼恩奖学金,这是该学院的最高荣誉奖,而且还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同时获得入院一等奖学金和哈顿尼恩奖学金。尤其是要获得哈顿尼恩奖学金,需要通过十分严格、艰难的考试。经过激烈的竞争,理雅各成为获胜

者。他在学生时代所显露出来的语言天赋,刻苦好学,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为他日后取得巨大成就必不可少的条件。

## 二、从传教士到伟大的 学者和翻译家

大学毕业后,理雅各感觉到自己对神学的热爱,于是进入海伯瑞神学院学习并决心去东方做一名传教士。不久,他被伦敦传教士协会接受为会员,并派他去马六甲,接受由马礼逊传教士创建的英华书院的院长职务。

1840年至1847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被清政府割让给英国。伦敦传教士协会开始考虑把英华书院移至香港。理雅各十分赞成这一决定。事实上,他早就希望到中国去传教了。从1843年到1873年,理雅各把他一生中最美好的30年都留在了香港。在与中国人民的不断接触过程中,他深深为中国古老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倾倒,于是产生了将它们介绍给西方的愿望。理雅各是第一位全面系统地四书五经译成英文的西方人,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理雅各之所以倾注毕生的心血研究、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是因为他一直对中国十分感兴趣,渴望了解中国。他对中国文明有着相当高的评价,他曾说,“确实,中国文明与我们的文明有很大区别,但是他们的文明绝非野蛮文明。我们看到,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繁荣,不断生长、壮大,而其它有些所谓具有更加优秀品质的民族如亚述人(古代东方一奴隶制国家)、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一些更加年轻的帝国,都经历了兴旺、鼎盛和衰亡时期,但是中国仍然存在……显然,这一民族必定有些颇具力量的美德和社会规范。”<sup>①</sup>而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典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从它们入手。随着理

雅各对中国文化的不断深入了解,他深深地爱上中国,他从事的这项工作的巨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则远远超过了他的初衷。

在翻译过程中,理雅各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第一,理雅各潜心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说明他是一位很有远见,很有胆识,很有胸怀的优秀学者。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由于清政府一再盲目妥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西方人有很强烈的欧洲优越感。英国一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诗人吉普林<sup>②</sup>是理雅各的同时代人,他的诗“白人的负担”正说明了这一点。吉普林认为东方人是半个魔鬼半个儿童的化身,英国必须把它最优秀的人送往东方去帮助他们获得文明。这首诗在当时十分流行。在西方人眼里,东方的国度甚至连文明都没有。而他的另一首诗“东方和西方”则更明确地指出东方永远不可能在任何方面赶上西方,永远也不会有东方和西方可以交流、可以对话的那一天。但是理雅各克服了种种偏见,他的努力为中西文化交流翻开了新的篇章,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第二,典籍译本的出版费用也是一个困难。好在当时在香港的一位英国商人查丁同意支付这笔费用。遗憾的是,查丁没有能够活着看到译著的出版。幸而他的弟弟一直帮助理雅各,使前五部译著得以顺利出版。

第三,做为一名外国人要熟练掌握汉语已十分不容易,而要读懂、理解古汉语就更是难上加难。理雅各所花费的心血恐怕局外人是很难了解的。他曾说,“很少有人能够知道翻译一本典籍的工作量有多大。”所幸的是,在语言这一关上,理雅各得到了中国学者王韬<sup>③</sup>的很大帮助。

理雅各很赏识王韬的学识,认为“他(王韬)对我的帮助十分大……只有一流的学者

对我才有价值，在这儿我无法找到能与他相媲美的人。”<sup>④</sup>理雅各曾这样评价王韬：“这位学者，他的经学知识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人……他为我提供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同时，他在工作的时候是很投入的。时而为我解释，时而又与我争论，他不仅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而且为日复一日的辛劳增色不少。”

要理解这些经典是很困难的，所以中国有很多研究经学的学派。理雅各是一位治学十分严谨的学者，他在完成每一篇译文之前都要反复研究不同学派的观点。为了使译文准确可靠，他还做了大量的注释和附录。此外，他还反复推敲，力求译文的完美。

理雅各几乎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事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工作，足以说明他是位有着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毅力的学者。既便是在今天，他的译文也是很有影响的，许多中外的学者常常引用他的译文。王韬对他的评价是最有说服力的：“在所有的西方学者中，理雅各是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的学识和学术成就却无人可比。他的译文详尽、易懂、准确，西方学者认为是极具权威性的。……很多西方学者只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但却没有把中国文化的精华带回西方去……在翻译四书五经的时候，理雅各没有向困难低头。他专心致志地研究十三经，收集、阅读、整理、分析了大量的资料。他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在研读了各经学门派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现在很少有人再研究中国的经学了。而理雅各，一位西方学者，却倾注毕生的心血致力于经学的研究、翻译、编辑、校对，而且译文相当完整、准确、易懂。他的译著是留给后世学者的宝贵遗产……理雅各学识渊博，为人真诚、谦虚、慷慨大度。”<sup>⑤</sup>

由于理雅各在中英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晚年他被推选为牛津大学第一任中文系系主任。在牛津任教期间，他又陆续

翻译了《孝经》、《道德经》和《庄子》，出版了《中国的宗教》等书。从一个传教士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

### 三、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理雅各的女儿在为他写的传记中说，理雅各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确实，如果对中国没有深厚的感情和爱，他是不可能花费如此多的心血去完成这样一项艰难的工作的。他对中国一些事物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十分好学的民族，中国人很爱读书。1858年，理雅各到广东参观了那里的科举考试会堂，当看到大厅里满是参加考试的人时，他感触颇深，没想到中国有那么多的读书人。他还十分同情中国妇女，坚决反对她们缚足，同时对杀戮女婴的罪行也给予了极大的谴责。当时，西方十分蔑视中国，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自己完整的史记，但是理雅各却指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拥有如此完整、融会贯通的历史，而且总的来说也是确实可信的。”<sup>⑥</sup>

理雅各对孔子的看法是这样的：“当我更多地研究了性格和观点之后，我就更加地崇拜他。他确实是一位很伟大的人，总的来说，他对中国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并且他的教义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也是很有重要意义的。”

在鸦片问题上，理雅各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他坚决反对英政府向中国输入鸦片，十分同情苦难的中国人民。1873年5月17日，他参观孔子的老家曲阜。他看到曲阜附近的一个村庄种有大片的罂粟，到处都有中国人在忙于种植鸦片，他的良心深受谴责。

“很遗憾，我们不仅把鸦片强加于中国，而且还让他们自己学会了种植鸦片。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和行为是终将要受到重重惩罚的。”<sup>⑦</sup>

理雅各与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先生的一段对话更是使他久久不能忘怀。大使是这样说的，“虽然你是英国国籍，但也几乎是和我一样的中国人了。因此，请你真诚地告诉我，中国和英国两个国家相比较，哪一个更优秀？”

理雅各稍做停顿，回答道：“大人，请别生气，我当然认为英国更优秀。”

大使继续说：“是的，我明白，如果你从工业力量、铁路、海军等方面比较的话，那毫无疑问英国比中国强。但是我是指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我希望你从这个方面比较一下。”

理雅各仍坚持他的观点，说：“大使先生，即使从这一方面比较，我也无法不认为英国更加优秀。”此时，理雅各观察到，“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如此惊讶的人。他开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用力伸出长袖中的双臂，也许是无意的，把他的一把镀金椅子甩到了屋子的另一边，那椅子几乎散了。过了一会儿，他重新站到我面前，说，但是，先生，那为什么贵国要强迫我们接受鸦片呢？”

郭嵩焘的话使理雅各受到深深震动，他无言以对，只是默默地对自己说，“听了这些话，我沉默了；我感到很羞耻……我的兄弟们，对于这个问题我只知道先知的回答是，停止做恶，学会行善。”<sup>②</sup>

这一段极为有力地证明了，理雅各认为英国，乃至西方社会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在他看来，就鸦片问题来说，英国已是在道德上退化了。

#### 四、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被世界列强瓜分的历史。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炮声的响起，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各种思想、宗教等等都一起传入中国。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不平

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西方文化流向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乃至东方的文化却很少被介绍到西方去。在理雅各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之前，17世纪的时候，另一位传教士利马窦把四书译成了拉丁文；一个比利时人则把五经译成拉丁文。西方的传教士在讲经布道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向欧洲各界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及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这样，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研究中国的古文明，有不少知名人士也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例如，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较早接触儒家学说的一位西方学者。他认为，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远胜于欧洲。沃尔夫是继莱布尼兹之后的一位儒家文化崇拜者。沃尔夫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精神，他赞美中国儒学的理性主义，认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原则。法国伟大思想家伏尔泰在政治上主张开明专制，而中国即是这种开明专制的模范。他说：“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他还指出中国的思想、制度都来自孔子，所以对于孔子十分崇拜。他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但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被大规模、系统地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去，理雅各是第一人。他的译文比较准确，还有大量的注释，至今仍被各国学者经常引用，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儒家文化不仅对中国，乃至对东方文明的构成和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古代，中国的儒家文化曾把整个东方文明引向一个十分发达的境地。后来，西方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西方文明得以遥遥领先。但是近年来，亚太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似乎预示了下一个世纪将是亚洲的时代。海外的一些华裔学者提出了儒学的复兴这一新概念，这也是儒学在经历

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五四运动和十年浩劫后的第三个大发展时期。儒学的复兴实际上蕴含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就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问题。西方文明虽然很先进,但是近年来,西方的经济发展缓慢,人际关系冷漠,道德沦丧,社会的前进也受到了威胁。这就促使西方一些思想家向孔子学说寻求解决伦理道德问题的启示。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在今天发挥更大作用,就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将其优秀的部分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在当代,儒学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日益受到东西方各界人士的重视。1994

年10月,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成立。理雅各的一部分译著也在国内一些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理雅各是一位很有远见的翻译家。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一份丰厚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可能孤立于另一方而获得繁荣美好的未来。真诚希望东西两方能早日联起手来,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理雅各做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先驱,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① 海伦·理雅各:《詹姆斯·理雅各,传教士和学者》,宗教宣传协会,伦敦,1905年,第28页。

② 吉普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

③ 王韬(1828—1897)是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他学识渊博,著述达四十余种,同时也翻译了很多书籍。他是近代中国新闻业的创始人,在近代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年轻时他致力于经世之学。到香港后结识了理雅各。二人为彼此的学识所吸引,成为致交。王韬不仅英语好,而且对经世之学很有研究,于是成为理雅各的得力助手。后来,理雅各由于身体原因回苏格兰休养时,邀请王韬一同前往。在欧洲游历期间,王韬大量吸取西方文化,研究西方富国强兵之道。回国后,他发表许多论文,提倡变法。1884年任《申报》编纂主任。

④ 同①,第34页。

⑤ 林塞·莱德:《詹姆斯·理雅各生平》,转引自《西书的英译·前言》,中国文化复兴协会,1980年版,第14页。

⑥ 同①,第94页。

⑦ 同①,第225页。

⑧ 同⑥。

## 参考文献

- 1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 2 徐远和:《儒学与东方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3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5 顾长声:《从司马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6 海伦·理雅各:《詹姆斯·理雅各,传教士和学者》,宗教宣传协会,伦敦,1905年版。
- 7 詹姆斯·理雅各:《儒学与基督教的比较》,特鲁比那出版社1877年版。
- 8 詹姆斯·理雅各:《中国的宗教》,查里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出版社,纽约,1881年版。

(责任编辑 双木)